

中國本身擁有力 量



鍾叔河 ■ 著



中國本身擁有力量的

百家文庫·史論集

鍾叔河■著

中華書局出版



文庫・史論集

責任編輯：危丁明



書名：中國本身擁有力量
著者：鍾叔河
出版：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
香港九龍彌敦道 450-452 號
印刷：陽光印刷製本廠
香港柴灣嘉業街 10 號 12 樓 B 座
版次：1989 年 11 月初版
© 1989 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
國際書號：ISBN 962 231 127 X

序言

現代性（modernity）與傳統（tradition）的衝突，是近代文化思想史上最基本的事實。但如果認為此二者絕不相容，又勢必導致現代化即全盤西化（wholesale westernization）的公式，這却與東亞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歷史不太相符，至少日本便是一個相反的例子。近年來，我越來越對中日兩國在「西潮」衝擊下反應之異同發生興趣，很想作一點比較的研究。故於黃遵憲《日本國志》《日本雜事詩》，下泊戴季陶、周啓明諸人之著作，一一求而讀之，自覺稍有心得。本集中《黃遵憲日本研究的劃時代意義》一文，便是我在這門功課上交出的第一份答卷。

當然，我對現代化（modernization）問題的研究的範圍還不限於此。E.Black在其

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一書中論述到：任何社會之變革，首視其領導階層之信心爲何如，而信心之來源又每每繫於傳統的價值觀與制度。此一論述，實至爲深刻。在現代化過程開始即「西潮」襲來之前後，中國社會的領導階層一直是儒家的士大夫。所以研究中國的現代化，不能不首先着眼於士大夫階層面對「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」的態度。在這方面，郭嵩燾實在是第一個值得重視的人物。他於光緒四年即公元一八七八年，在觀察和思考的基礎上即已作出這樣的結論：

中國聖人之教道，足於己而無責於人，即尼山誨人不倦，不過曰往者不追、來者不拒而已。佛氏之法，則捨身以度濟天下，……西洋基督之教，佛氏之遺也。

……聖賢不欲以兼愛亂人道之本，其道專於自守；而佛氏之流遺，至西洋而後暢其緒。

又進一步述評「西洋基督之教」云：

其言曰，視人猶己，……繼紹乎天以成其事業，實有繼事述志之責。故其自視常若天之子，而凡同爲人以並生於天地之間者，皆兄弟也。……固不能逮佛氏之精

微，而其言固切近而可深長思也。

這裏將「中國聖人之教道」即儒家傳統價值觀和「西洋基督之教」即西方價值觀所作的比較，遠遠超越了當時一般士大夫的水平。

郭氏還對中西制度之不同發表了看法：

西洋君德，視中國三代令主，無有能庶幾者；即伊、周之相業，亦未有聞焉。而國政一公之臣民，其君不以爲私，……自始設議政院，即分同異二黨，使各竭其志意，推究辨駁，以定是非，而秉政者亦於其間迭起以爭勝。

又云：

（中國）聖人以一身爲天下任勞，而西洋以公之臣庶。一生之聖德不能常也，文武成康四聖相承不及百年，而臣庶之推行無窮，愈久而人文愈盛，頗疑三代聖人之「公天下」，於此猶有歉者。秦漢之世，竭天下以奉一人，……而三代所以治天下之道於是乎窮。聖人之治民以德，德有盛衰，天下隨之以治亂；……西洋治民以法，法者，人已兼治者也，……其法日修，即中國之受惠亦日棘，殆將有窮於自立

之勢矣。

郭嵩燾深知「中國成法，遵行已三千餘年，本不易言變通」，但同時他又堅定地認為：「雖使堯舜生於今日，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，不能一日緩也。」可惜的是，他在當時中國社會的領導階層中居於絕對少數的地位。朝廷認為他「出使西洋，所著書籍，頗滋物議」；清議譏刺他「不見容堯舜之世，何必去父母之邦」；鄉紳集議要搗毀他在長沙的住宅；京官更有奏請「戮郭嵩燾、丁日昌之屍以謝天下」的。此種情形，終於使他「仰天歔歔，發憤嘔血，志氣爲之銷靡，才智聰明亦爲之遏塞」。

本集中《論郭嵩燾：現代化觀念的先覺》一文，我是帶着深深崇敬和惋惜這位同鄉前輩的感情寫出來的。中國在十九世紀失去了大好的時機，這是郭嵩燾的不幸，也是中國的不幸。

然而，儘管體大思精、源遠流長的儒家文化是如此的「足乎己無待於外」，儘管它的排他性和「專於自守」是如此的頑強，隨着通商口岸的開闢，隨着新技術和新知識的輸入，在傳統的士大夫階層中，畢竟也開始孕育（或蛻變）出了第一批帶有intellectual

即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色彩的人物，徐建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

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的動搖性、曲折性、軟弱性、反覆性，非常具體地反映在像徐建寅這樣一個滿懷憂國憂民、畢生追求富強、終於無可奈何、不得志於當世的技術專家的身上。徐建寅基本上不談政治，看得出在一些重大關頭他寧願「繞開政治走」，但是政治却始終沒有放過他，從好的和不好的兩個方面說來都是如此。百日維新時，他被起用任新設立的「農工商局」的「督理」，「賞給三品卿銜，一切事件准其隨時具奏」。戊戌政變發生，農工商局旋即被「裁撤」，徐建寅也只得借口「掃墓」，脫離政界，歸隱家園。後來張之洞請他到湖北辦火藥廠，他成了一個「日手杵臼，親自研煉」的純粹技師，終於在一次試驗事故的爆炸中犧牲了生命。本集中《現代化早期一位技術專家的道路及其教訓》一文，對於後人也還是可以引起一點思索的。

郭嵩燾、徐建寅和黃遵憲，他們作為最後一代士大夫和最早一代中國的intellectual，在「五千年來未有之創局」中無一例外的悲劇性結局，並不應該使今天為現代化而奮鬥的我們喪失信心。郭嵩燾卒於一八九一年，徐建寅卒於一九〇一年，黃遵憲卒於一九〇

五年。他們都是十九世紀的人物，屬於過去了的時代，沒有可能戰勝（甚至也沒有可能公開反抗）傳統的價值觀和制度。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，仍然在繼續着使中國現代化的事業，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。H.N.Shore氏評論容閔時寫道：

一個能够產生這樣人物的國家，就能夠做成偉大的事業。……中國本身擁有力量的，可以在真正完全擺脫迷信的重擔和對過去的崇拜時，迅速使自己新生，把自己建設成爲一個真正偉大的國家。

這段話我極爲喜歡，不止一次地引用過。是的，中國本身擁有力量。看到這個偉大的力量並且努力來激發並加強這個偉大的力量，把中國建設成爲現代化的真正偉大的國家，就是我們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的使命。

目錄

序言·····	一
一 中國本身擁有力量·····	一
二 黃遵憲日本研究的劃時代意義·····	一一
三 論郭嵩燾：現代化觀念的先覺·····	七四
四 現代化早期一位技術專家的道路及其教訓·····	一四七
五 十九世紀旅西中國知識分子記述的歷史價值·····	一八七

一 中國本身擁有力量的

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起，一百四十年來，無數愛國的知識分子，一直努力想要解決一個問題：怎樣使中國早日實現現代化，趕上先進的國家？也就是如何從故步自封的局面中解放出來，迅速地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。

閉關自守是封建社會的特徵。封建社會落後的生產方式，把人們束縛在狹小的地面上。封建的、宗法的、陳舊的觀念，禁錮着人的頭腦，壓抑了人的精神，使人們缺乏力量去想像和追求一個廣大的、多樣化的世界。當西歐經過文藝復興、地理大發現，逐步發展起城市經濟、航海通商和近代文明時，中國仍然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專制國家。直到英國兵艦駛進廣州內河，道光皇帝還不知道英吉利在什麼地方，與中國有無旱路相通。

連頭腦清醒如林則徐、魏源等人，開始也曾以爲英國兵的腿足不能屈伸，上了岸就不能打仗。這就像一個蒙上眼睛的人，遇到窺伺已久的對手，挨打吃虧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林則徐、魏源的可貴之處，就在於他們能够從吃虧中吸取教訓，最早提出應當了解外國（「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」）和學習外國（「師夷長技以制夷」）。他們所謂的「悉夷情」和「師夷長技」，都是爲了「制夷」——遏制外國的侵略。他們不僅是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先驅，也是爲了祖國富強而探索走向世界的道路的先驅。中國近一百四十年的歷史，確實應該從他們寫起。

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，從林則徐、魏源、洪仁玕到康有爲、嚴復、孫中山，這一百四十年的前七十年中，並沒有能够解決中國走向世界這個問題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，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，中國人開始有了新的世界觀。但是，一方面由於積重難返，另一方面由於出現了曲折和徘徊，後七十年也沒有徹底解決這個問題。只有在近幾年糾正極左那一套之後，國家才有可能實行對外開放政策。

當然，國家利己主義是客觀的存在，發達國家勢必要佔不發達國家的便宜，中國進

入近代社會以後，也確有少數人屈從於列強，讓它們牽着鼻子走。但這種人決不是林則徐和魏源，而是那些最頑固、最守舊、最保守的統治者。他們和人民尖銳對立，對自己沒有信心，只能靠閉關自守保住江山。一旦「關」閉不住了，又是他們最怕老百姓乘機造反，最容易屈膝投降，崇洋媚外，在「保護傘」下去做兒皇帝和奴才總管。至於一百四十年來先進的中國人，他們贊成開放，反對閉關，是爲了趕上先進國家，使中國自立於世界。他們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，決不會拜倒在洋人脚下，成爲洋人洋貨的奴隸。

若對我們民族從封閉社會走向現代世界的歷史，作一番縱橫觀察。即可發現，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歷史。它既是中外交往史，又是文化思想史；既是政治史，又是生活史；既是「西學東漸」史，又是反帝鬥爭史。在今天中國現代化的艱難進程中，重溫一下昨天和前天的這些歷史，我認爲是十分有益和有用的。

前面說過，一八四〇年英國打到廣州來時，中國人對於歐洲還一無所知。關於「泰西」，通行的還是「洋鬼子挖眼睛合藥」一類荒誕無稽的傳說。怎樣由無知變爲有知呢？只能靠直接去接觸和了解。一八七六年到費城參加紀念美國建國一百周年舉辦的

世界博覽會的中國工商界代表李圭，在其著述《環遊地球新錄》中說：

地形如球，我中華不信是說者十常八九，圭初亦頗疑之。今奉差出洋，得環球而遊焉，乃信。……使地形或方，日動而地不動，安能自上海東行，行盡而仍回上海，水陸共八萬二千三百五十一里，不向西行半步歟？

這完全是實話。地球是圓的，今天連小學生都懂得；但在當時，却發聵震聵，起了很大的啓蒙作用。戊戌領袖康有爲，就是在他二十二歲讀了《環遊地球新錄》等書後，才立志走「向西方尋找真理」的道路的。

再以中國對荷蘭的了解爲例：雖然從明朝起就聽說有個荷（和）蘭，但對荷蘭真正有知，也要到斌椿訪問荷蘭才算開始。試將斌椿《乘槎筆記》和《明史》關於荷蘭的記載作一對比：

斌椿《乘槎筆記》：「荷蘭縱六百五十里，橫三百五十里，西北濱大西洋海，夷坦無山，港道紛歧。民受水害，因習水利，善築堤，又善操舟行運。南洋各島國，皆建立埔（埠）頭。……」

《明史·和蘭傳》：「和蘭又名紅毛番，地近佛郎機。永樂、宣德時，鄭和七下西洋，歷諸番數十國，無所謂和蘭者。其人深目長鼻，髮眉皆赤，足長尺二寸。……其所役使名烏鬼，入水不沉，走海面若平地。」

所謂「百聞不如一見」，確實是不錯的。當越來越多的人，通過直接的接觸和了解，對外部世界由無知變為有知，封閉社會也就自然會變為開放了。

當然，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。十九世紀的中國人走向世界，不僅僅是爲了擴大眼界，增進知識，而是爲了學習先進，救國救民。在這方面，人們往往需要克服比遠海高山更難超越的障礙。當第一位常駐歐洲的使臣郭嵩燾接受任命時，北京有人用「集句」形式做了一副嘲罵他的對聯：

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不見容堯舜之世；

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

作者把外國人一概罵爲「鬼」，把正常的外事活動斥爲「事鬼」，倒可說爲一百年後戚本禹之流指使紅衛兵燒外國使館的「不怕鬼」行動開了先河。其實，這不過反映了破落

戶對新世界和新事物的盲目恐懼和極端仇視，和人民羣衆對列強侵略的抵抗和憤怒，性質是完全不同的。

研究人類文化史的人都知道，一種文化決不能靠排斥其他文化而得到真正的發展。有沒有容納外來成分的氣魄，有沒有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的能力，正是衡量一種文化生命力强弱的標誌。到清朝末年，統治者的思想已經完全僵化，陷入了無法擺脫的危機；但是植根人民、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，却沒有和專制統治一樣地老化和衰朽，仍然保持着它的活力。

曾紀澤出使英法時，也遇到了和郭嵩燾同樣的情形。不少人反對他講西學、談洋務，說什麼凡是先聖昔賢沒有記述過的道理，凡是六經典籍沒有記載過的東西，學者都「不得過而問焉」。曾紀澤在一篇文章中駁斥他們道：

夫先聖昔賢之論述，六經典籍之記載，足以窮盡宇宙萬物之理若道，而不必賅備古今萬物之器與名。學者於口耳之所未經，遂概然操泛泛悠悠茫無實際之莊論以唐塞之，不亦泥乎？上古之世不可知，蓋泰西之輪楫，旁舞於中華，五千年未有

之創局也。……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見聞，當時存而不論，後世無述焉，則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擴而充之，以通吾之所未通，……不得以其異而諉之，不得以其難而畏之也。

曾紀澤並沒有否定「先聖昔賢之論述」、「六經典籍之記載」。但他強調指出，不能靠「泛泛悠悠茫無實際之莊論」來適應「五千年未有之創局」。他說：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」已經不在人間，他們並不了解當今的世界。對於外國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，應該由我們自己通過直接接觸去考求；這樣才能擴充我們的知識，應付當前的局勢。對於這件事情，是既不應簡單拒絕，也不必畏縮害怕的。

「就吾之所已通者擴而充之，以通吾之所未通。」這是一種何等博大寬容的態度啊，它充分表現了中國文化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的這一部分積極的傳統，說明古老的中國文明還是可以「與時俱進」的。當然，這也得有曾紀澤這樣「不以其異而諉之，不以其難而畏之」的態度。應該說，在早期走向世界的知識分子中，持這種態度的人相當多；忘記祖宗、盲目崇外的人當然不會沒有，但這種人在歷史上是毫無地位的。